

全球对话

5.1

GLOBAL DIALOGUE

4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查理周刊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通往公共社会学

Nira Yuval-Davis

批判介入

Issa Shivji

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

实践公共社会学

Ariane Hanemaayer and
Christopher Schneider

全球论坛

- > 非正式场域的抗争
- > 法国工作型态的转变
- > 印度尼西亚社会学

MAGAZI-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erbert Docena

VOLUME 5 / ISSUE 1 / MARCH 2015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论作为一位公共社会学家

这期的全球对话由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的文章开场，主要是讨论法国 Charlie Hebdo 的漫画家的屠杀惨案。若是有什么事件特别要求社会学家的分析视野时，那这个事件就是响应了这样的呼吁。这篇文章分析了这起杀人案的理由，凶手的背景本质，漫画的影响，法国政府的响应，以及大众的声浪。我们所学习到的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并不总是被赋予的，而更像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场域，这对于“穆斯林”和“恐怖分子”这两个概念也是如此——一个恐怖分子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社群自由斗士。总之，Santos 专业的分析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的视野。我们必须从暴力和极端主义的结构中去看待整起事件，而更不能忽略了国家通常也是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行使者的这个往往被忽视的观点。

这起凶杀事件很值得社会学的分析，但是社会学家默不作声，害怕在这个复杂的领域中留下印记，也害怕成为公共社会学家。的确，成为公共社会学家是一件危险的事。而 Nira Yuval-Davis 指出两条公共社会学的路：第一是自我放逐，成为学界的边缘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色列社会学家 Baruch Kimmerling，研究以色列的核心议题，但是却用很批判的角度观之。面对非洲各种不同的挑战，Issa Shivji 的文章描述了运动者同时也是学者的公共社会学实践，批判坦尚尼亚的政府，并捍卫大学的自主性。

公共社会学并不必然危险的，但是一定很复杂且重要。Herbert Docena 已经报导了联合国后变迁的会议好几次，这次他把重点放在日益茁壮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如何要求更进一步的介入行动。最后，公共社会学也可以在地化实践，像是 Ariane Hanemaayer 和 Christopher Schneider 所指出的，在咖啡厅中可以把大学带入公众之中，以及开放的教室如何把共众带到教室里面。

这期的全球对话也报导了三场论坛会议。第一，是有关于都市开发和土地驱离的议题，这发生在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南非、赞比亚。尽管对于住民的暴力相向，抗争还是不断持续，而且不是自愿性的发动，而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有的时候很成功，可是通常以失败坐收。我们也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学动态的文章，有 5 篇文章讨论民主如何型塑了宗教、教育、劳动、社会流动等。另外有 3 篇文章讨论法国的工作模式：新式的实验室，慢性疾病的的工作场所调整、多元积极社会的图像：模糊了薪资劳工、无偿的照顾工作、以及公民活动之间的界线。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牙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以全球的视野去分析查理周刊惨案。



Nira Yuval-Davis 是杰出的社会学家，领域是性别、人权。其和以色列社会学家 Baruch Kimmerling 的想象对话讨论了公共社会学的道路。



Issa Shivji 是长期并且著名的左翼坦尚尼亚知识分子。其接受学生的访谈。



Global Dialogue is made possible by a generous grant from SAGE Publications.

全球對話以 15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Takazumi Okada, Fuma Sekiguchi, Kazuki Uyeyama.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sanova, Julduz Battalova, Almagul Nurusheva, Daurenbek Kuleimenov, Elmira Otr.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Martyna Dolores, Mariusz Finkielsztej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Przemysław Marcow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Corina Brăgar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Ruxandra Iordache, Mihai Bogdan Marian, Angelic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Mădălin-Bogdan Rapan, Alina Stan,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Corbacioglu, Irmak Evre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论作为一位公共社会学家

2

查理周刊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Portugal

4

通往公共社会学的两条路

by Nira Yuval-Davis, UK

7

批判介入的一生: 访谈Issa Shivji

by Sabatho Nyamsenda, Tanzania

10

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

by Herbert Docena, Philippines and USA

13

实践公共社会学

by Ariane Hanemaayer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Canada

16

> 非正式环境的抗争

重新定义城市权利: 智利人民运动

by Simón Escoffier, UK

18

乌拉圭的游民政治

by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Colombia

20

巴西无壳蜗牛工人运动

by Cibebe Rizek and André Dal'Bó, Brazil

22

南非的穷人抗争

by Prishani Naidoo, South Africa

24

赞比亚: 没有反抗运动的驱逐压迫

by Singumbe Muyeba, South Africa

26

> 法国工作型态的转变

创新实验室和黑客空间: 新形成的文化

by Isabelle Berrebi-Hoffmann, Marie-Christine Bureau, and Michel Lallement, France

28

在多元能动的社会中追求性别平等

by Bernard Fusulier, Belgium, and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France

30

工作中慢性疾病的协商

by Anne-Marie Waser, Dominique Lhuillier, Frédéric Brugeilles, Pierre Lénel, Guillaume Huez, Joëlle Mezza, and Cathy Hermand, France

32

> 印度尼西亚社会学

庆祝印度尼西亚的民主

by Lucia Ratih Kusumadewi, Indonesia

34

财团化印度尼西亚的教育

by Kamanto Sunarto, Indonesia

36

印度尼西亚的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

by Hari Nugroho, Indonesia

38

当宗教成为合法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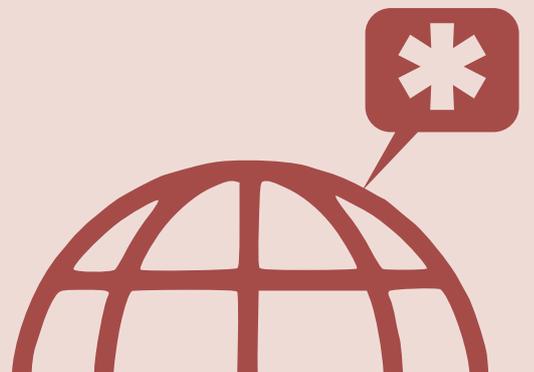
by Antonius Cahyadi, Indonesia

40

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向上流动

by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Indonesia

42



> 查理周刊

一些棘手的议题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University of Coimbra, Portugal and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of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图：各国领袖在Paris聚首。

发生在法国的查理周刊记者被屠杀惨案其实很难让人真正冷静下来想想这之中的前因后果。不过分析整起事件还是很重要，因为这有可能会演变成星火燎原，以后可能发生在小孩的学校、家中、甚至其他地方。我以下提出我一些看法。

> 暴力与民主

我们其实很难在因果上把查理周刊的悲剧和美国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连结起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方的极端侵略主义已经造成了上千上万人的死伤，多数是穆斯林。而且，对于年轻穆斯林的怀疑所带来的暴力和刑求等事件也层出不穷，

>>

从最近美国对国会提出的报告中就可知道这点。而我们也知道许多年轻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也宣称其激进行动是来自于那些被低估的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从这点来看，我们必须停止，并且思考是否这是最适合的减少暴力的政策，因为这带来的反效果已经太明显了。而法国对于这次的攻击事件的响应是去暂停民主、宪法的运作，这预设了对付这种犯罪应该是要以暴制暴而非寻求法律途径，而且以暴制暴也似乎不违反西方价值。这样一来，我们可能进入一个内战的状态。而在欧洲，什么国家会这么做呢？显然不是西班牙的 Podemos 也不是希腊的 Syriza。

> 言论自由

而言论自由本身也是珍贵的商品，可是，言论自由也有其限制。而事实上，多数的限制都是被那些支持无限制自由的人在面对自己的自由被限制的时候所施加给其他人。例如，在英国，若是你批评首相 David Cameron 手上沾满鲜血，那你很有可能因此坐牢。而法国的女性穆斯林则不准戴 hijab。2008 年，漫画家 Sin é (Maurice Sinet) 因为写了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而被查理週刊开除。这些其实都意味著言论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而这只是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标准。以拉丁美洲为例，主要的媒

體都被大公司或大家族壟斷，而媒體也都是第一個喊說不要限制言論自由的人，因為這樣他們才好批評政府幫助窮人的政策。所以，查理週刊當諷刺穆斯林的時候喊說言論要自由，但是許多的漫畫其實也都可以被解讀成助長了恐伊斯蘭症或是席捲歐洲的反移民浪潮。此外，許多漫畫中所描繪的穆斯林先知都是在一些不恰當的文章中所得來的印象，還有極右派的文章。該文描繪了一群懷孕的穆斯林女性為 Boko Haram 组织的性奴隶，而手则放在她们的腹部上，说“把手从我们的社会福利上拿开”。一来，这个漫画污名化了伊斯兰，女性，还有福利制度。而多年之后，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社群把这个看成是种攻击。二来，其对巴黎这次惨案的响应则是非常迅速。总之，我们必须反省那些我们被视为稀松平常的普世价值。

> 包容和“西方价值”

而这次事件的脉络则是有两种意见垄断了诠释，这两种意见没有一种是有建设性的，无助于一个更包容、多元文化的欧洲。而最极端的表现则就是恐伊斯兰症和反移民。欧洲的极右派鹰派抬头，而温和右派则怕选举会失利（像是希腊的 Antonis Samaras）。而对于右派思想而言，欧洲文明的敌人就在“我们”之中，这些

人讨厌“我们”，这些人拿“我们”的护照，若想要解决文明的危机，那就要把这些人赶走。反移民的诉求再明显不过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谈包容。这些人和“我们”很不同，这些人是负担，而“我们”却要因为这些人有用处就包容这些人。“我们”当然可以包容，不过前提是这些人行为守法，内化我们的价值。

但是，什么是“西方价值”？在许多世纪之后，欧洲历经了许多以西方价值为名的灾难，包括了殖民暴力和世界大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西方价值。例如，没有人质疑自由，但是却没有人不质疑平等和友爱的，可是这两个价值却是战后欧洲民主与福利的基石。然而最近社会保护也开始被质疑了，社会保护其实是在确保社会整合，但是现在被看成是奢侈的，不论中间偏右或偏左都这么认为。难道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不是现在社会危机的原因之一吗？这难道不是助长极端主义的温床吗？难道不是族群和宗教的歧视所导致吗？

> 政治信念而非文明的冲突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文明冲突，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其实来源相同。我们看到其实是政治信念的冲突。历史告诉了我们政治信仰及其冲

>>

突其实和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有关。他们从来不考虑普罗阶级，但是普罗阶级却是在整个冲突中当先锋而牺牲。我们会看到在欧洲，那些宗教战争和帝国殖民等等，都是例子。而欧洲之外，一向被视为温和的佛教也正当化了斯里兰卡的 Tamil 弱势族群的被屠杀事件。而印度总统 Modi 最近的胜利被视为可能会恶化印度教基本教义派对于 Gujarat 穆斯林的屠杀。而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迫害也是，甚至伊斯兰国 (Islamic Emirate) 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屠杀伊斯兰教徒。这些是对于无限制世俗主义的维护吗？还是极端主义的表现？而极端主义反对彼此吗？彼此有关连吗？伊斯兰圣战士和西方秘密服务有关系吗？为什么圣

战士会被西方视为恐怖主义者，而却又被视为对抗 Gaddafi 和 Assad 的自由勇士？而伊斯兰国又如何被沙特阿拉伯、卡达、科威特、土耳其所援助？他们是西方的盟友，不是吗？这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那些政治信仰冲突下的牺牲者其实都是那些没有政治信仰的穆斯林人口。

> 人命的价值

欧洲人在这次事件中所受斗到的冲击和震撼绝对是无比的，也让我想知道为什么欧洲人没有在类似的事件中，譬如无辜死亡的事件，有感受到相同的震撼，也没有想到和查理周刊可能有关。就在查理周刊惨案的同一天，也门有 37 个年轻人被炸弹杀死。去年夏天，以

色列的攻击造成了 2000 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1500 人是平民，500 人是小孩。墨西哥则是自从 2000 年以来，有 102 名记者被杀害，只因为他们支持出版自由。去年 11 月，在 Ayotzinapa 就有 43 人被杀害。当然，没有人会说欧洲白人，基督教徒的命比较珍贵，比非欧洲人和有色人种珍贵，可是为什么被忽略了？只因为大家不熟悉吗？另外，基督教友爱邻居的教义所扮演的角色为何呢？而媒体和政治领导者又怎么把整建事件自然化，看成好像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呢？■

来信寄给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bsantos@ces.uc.pt>

> 迈向公共社会学的 的两条路

by Nira Yuval-Davi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UK, President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Racis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RC05), 2002-6 and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for ISA World Congress in Durban, 2006



Nira Yuval-Davis是以色列的异议人士，长期以来为人权发声。他也是Women Against Fundamentalism的创始人之一，并且也是Women in Militarized Conflict Zones的会员。后者是一个联合国的咨询机构，同时也是许多NGO的咨询机构，像是Amnesty International。她对于性别、种族主义、宗教基本教义派等的研究在国际上享誉盛名，著作包括了Racialized Boundaries, Gender and Nation,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Women against Fundamentalism。她同时也是East London大学的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Refugees and Belonging的执行长。这篇文章中，她将会和Kimmerling对话，讨论公共社会学的两条路。

Baruch Kimmerling 是 1948 年后从罗马尼亚逃到以色列的难民，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Baruch 和我是朋友，我们从大学时代就认识，并且同在 Hebrew 大学就读。Baruch 现在则还在那边。后来我则去念硕士，那时是 1969 年，我到了美国，后来又到了英国。其实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都反对 Shmuel Eisenstadt (以色列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但是我们的方法取径并不同，政治立场也不一样。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很反对非犹太复国主义或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去研究以色列国家和社会。许多年之后，因为我研究了以巴冲突与社会，Baruch 和我有不一样的结论，而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复国主义者。他发展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而我则走上研究认同归属的政治。

2007 年 Baruch 死了，我则是被邀请去纪念会上发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际学者之一。我说了有关以色列存有的焦虑，这也是 Baruch 称的 Akhusalim，就是 Ashkenazi, Secular and Labor Zionists，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非常主导。我把这个存有焦虑连结到许多广泛的因素，有些和所有的霸权弱势团体相似，特别是在殖民地区。其他则和新自由主义风险社会一样。还有和以色列社会永久战争状态有关的，以及正在出现的犹太基本教义派，侵蚀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半世俗政权。

我很惊讶的是，我说的居然有接收到很正面的回馈，这很之前的经验很不相同。(然而，虽然激进的讯息已经被讲者传递出去，而会议时候也没有受到挑战，我的论文还没被出版，而且经过了 5 年才出版，这显然就是会议主办单位 Van Leer Institute 的抗拒所导致。)

我想要特别推荐 Baruch 的自传 (1)。这个自传充满了智慧和诚信，而且会帮助读者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可是，这自传也带出了几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有两个。

>>

公共和专业社会学

Baruch 论证说他把他的公共行动和专业领域切割开来，也就是韦伯的传统，Donna Haraway 所称的“上帝可以窥见任何事物”。相反的，我认为知识和想象是有脉络的，也就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其他几近的学派像是马克思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我不是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而是认为知识的判断有其脉络，并不能一概而论和比较。而个人的立场（包括社会地点、认同、规范、价值、经验、实做、流动的、结构的、过程的）都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知识只能从辩证和建构的过程中被逼近，我的很多观察也都是在特定时空下进行的。

我对于 Baruch 二分政治和专业的问题并不只是认识论上的。透过我的社会学生涯和社运经验，我发现这个二分法其实是让两者都可以学习到对方的精神，学术研究可以让运动者更了解社会结构的来龙去脉，而运动者也可以得到学者更多同情和关怀的眼神。再者，其实做研究的时候，这条界线是模糊的，因为你真的很难实际上切割开来。

Baruch 的公共介入显示了重迭的图像，而切互惠彼此。从他开始决定研究以巴冲突的时候，也就是 1969 年咖啡厅爆炸案之后，其实就重迭了。我很怀疑 Baruch 所宣称的他在学术著作中对于制度的依赖会少于政治作品。Baruch 自己也说到了 Kuhn 的理论，一旦典范变了，资料收集就会完全变了。可是，当他说大家只读他短的评论文章而感到气馁时，我是同情他的气馁的。

Baruch 的知识典范转变和他对于以巴社会的理解让我们有了第二个疑问。这是因为 Baruch 宣称这个位置是“中心的边陲”，是他公共社会学里的一个默认，也是模型。

公共社会学中社会位置的角色

Baruch 用完整，反身，诚实的态度去描述他在以色列最历史悠久的报纸 Ha' aretz 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 Sabri Jiris 的书：The Arabs in Israel。后来，Baruch 了解到 Sabri 其实是对的，也因为没有办法取得历史数据的管道，他对于以色列政府的能力是有所低估了。Baruch 承认这也发生在批判 Ian Lustick 的书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他后来其实对这本书相当赞赏。（虽然他在自传中没以提及，可是当我编辑的书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出版于 1975 年时，他告诉我最好不要把它加到 CV 中，以免惹麻烦。那本书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章其实都和 Baruch 晚期立场接近。）



Baruch Kimmerling 出生于 1939 年，母亲是匈牙利人，父亲是罗马尼亚人。而在逃离犹太屠杀之后，他们全家移民到以色列，并在那边长大成人。他在 Hebrew 大学读社会学，而且终其一生。而后来 1969 年大学的咖啡厅爆炸案发生后，他转向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历史与根源，并发展出了和以色列官方不一样的论述。而作为一个批判政府的知识分子，他受到很大的指控。透过教学和写作，他企图要影响以色列的公众，支持更民主的制度和更公平的社会，取消军事侵略，并且追求和平和人道主义。Baruch Kimmerling 死于 2007 年，一生坚持理念，担忧以色列的未来。其著作包括 *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1983), *The Invention and Decline of Israeliness: State, Culture and Military in Israel* (2001); *Politicide: Sharon'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2003)。

而过去几年来，Baruch 可以去重新评估他对于以巴社会冲突的理解是否适当。他后来变成成功的公共社会学家，作品非常有影响力。我对于事物的看法与理解其实一直在变，我希望像 Baruch 一样，将会可以坚持己见。可是我想要讨论 Baruch 的两个主张。

第一，Baruch 认为他新发展的观念和见解非常独到，没有受到什么其他人的影响，也没有受到辩论影响。这样非辩证的理论建构，包括自我和知识，其实似乎没有完全体现了知识和态度形成的过程。讽刺的是，这也侵蚀了公共社会学的基础，因为公共社会学强调另外的分析和事实呈现。

第二，Baruch 认为他可以变成一个公共社会学家，因为不像我们其他人在边陲，他其实被认为是“自己人”。换句话说，他是有正当行的批判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肯任他。Baruch 认为这个可以让他去发表在主流的以色列媒体之中，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反犹太主义者则很难发表在主流媒体上。这样的正当行，他认为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的有效管道。

Baruch 见计这个偶然性的接受是来自于其对于 Jiris 和 Lustick 的批判。这是对于其分析的否定，并且后来也得到了认可。但是这个观点让我们有了一个主要理论、政治的难题：一个人一定要在累积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前，去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的正当行吗？而若是这个过程当中让批判力道减弱了呢？(2)

对于这个问题很难有个简单的答案。给定现在的以色列政治与社会情况，加上其他地区的状况，我时常觉得绝望，即使我想要像 Gramsci 一样产生希望，乐观，但都很难。虽然 Baruch 从中心开始，不是从边缘出法，他感到气馁和沮丧是常有的。我想我很愿意听听看读者怎么看待公共社会学，怎么看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怎么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来信寄给 Nira Yuval-Davis <n.yuval-davis@uel.ac.uk>

> 批判介入的一生

访谈 Issa Shivji



| Issa Shivji.

Issa Shivji 是非洲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原本是在 Dar es Salaam 大学主修法律 (1967-1970)，后来和 Giovanni Arrighi,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John Saul 等学者，成为了左派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世界各地，成为了一股知识分子的大学代表。而当时 Shivji 是个年轻的学生，但是后来挑战了坦尚尼亚第一任总统 Julius Nyerere 的 Ujamaa 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在这个早期的时代，他写许多书，像是广被讨论的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着重那些后殖民时代在政治上没有代表权的人民。而后来他从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和 Dar es Salaam 大学

拿到学位之后，他在法律系取得教职，一直到 2006 年。这段期间，他成为了诉求土地改革和宪法改革的公共人物，而后来虽然政治很动荡，并且他一直批判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和大学财团化，他还是幸免于难。2008 年他被授予了泛非洲研究中心的 Mwalimu Nyerere 主任，试图让大学成为辩论的场域。总之，Shivji 启发了很多年轻学子，也积极参与 ISA 在南非 (2006) Durban 的世界大会。

SN: 你和 Dar es Salaam 大学 (称作 Mlimani 或是 Hill) 的关系始于 1967 年，那时你是法律系学生，然后毕业后你加入了该校的法律系教职。那是你担任了 36 年的职位。我想问的是，为什

>>

么你一直留在大学，然而你的进步同事们选择加入其他的机构呢？

IS: 是的，我的许多战友都加入了其他的机构，包括了国家公职，政党，或是军队。这听起来或许直觉，可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集体的决定，看谁在哪个职位上会比较有帮助。战友同志们认为我应该在大学，我也同意，因为我可以从事进步的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工作。

而大学也提供了相对多的空间让我从事进步批判的工作，那也是一个让批判知识分子可以保持创意与活力的场域。那时候，民族主义的信念和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让许多年轻激进的学者发展出许多思想，许多人成为高中的教师，让批判的思想得以延续。

我从来没有后悔担任这个职务。

SN: 在你的 *Accumulation in an African Periphery* 一书中，你把非洲和坦尚尼亚后殖民经验区分成 3 个阶段：民族主义（1960 和 1970 年代），批判时期（1980 年代），以及新自由主义（1990 年代至今），这些转变如何影响了 Mlimani？

IS: 大学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受社会影响。80 年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特别对于非洲来说是如此。那时候大学没有资源，并且被新自由主义所绑架。我们许多同事都到了南非去，像是莱索托、博茨瓦纳、史瓦济兰、纳米比亚等国。

但是有些人留下来了。包括许多激进年轻的学者，注入许多进步的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民族主义年代的头 20 年内。他们继续生产好得东西，例如，他们开启了一场很棒的宪法辩论（1983-4），讨论反威权和反国家的战略。当然，每个人的企图不同，那些把自由民主、人权、多党等视为终极目标的会要求改革。可是那些民主抗争人士会要求阶级的独立行动。他们称为革命的改革。一个例子是改革派会要求立即的制度改造，而革命派会要求先分离政党和国家，然后开启辩论，让人们达成共识而后行动。

在这个转变下，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时代，该大学仍然是意识形态和斗争的中心，抵抗了第三阶段了新自由主义巩固和国家与大学的企业集团化。

SN: 2008 年，你被任命为泛非洲研究中心的 Mwalimu Nyerere 主任（Kigoda 在 Kiswahili），是第一位，而后来你也说“让 Nyerere 的遗产可以持续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你所说的遗产是什么？因为你曾经说过 Nyerere 是反对马克思

主义和反对由下而上的斗争。

IS: Nyerere 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进步的泛非洲和反帝的人。可以确定的是，其反帝国主义不是以激进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像是 Nkrumah 那样，而是其支持人民的持续性。

若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比较，他对混乱、压制进步声音，甚至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让激进人士不愿去回忆 Nyerere 的遗产是如何对抗资本主义的。

Nyerere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没有假装过。马克思自己遇到肤浅马克思主义时也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作为领导者，他的确站在抗争的对立面。不过这不代表那些激进人士不该参考 Nyerere 的遗产，并且从中学习。我的朋友，马克思主义不纯洁啊，是很政治的！

SN: 你所说的 Nyerere 影响的“矛盾性格”是什么意思？

IS: 我想我不能做得比 Mwalimu 还要好。他把学生因为对抗国家而游行抗议当掉赶出大学之后的几个月之后（1978），他造访了这个大学。一个学生很勇敢地问了一些问题：“Mwalimu，你相信民主，可是当我们抗议的时候你却叫警察来打我们！”

Mwalimu 看着这个学生，回答：“你想期待什么？我是这个机构的头，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力。若你惹事生非，我当然会叫警察。但是你就停止争取民主吗？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原文节录）

SN: 伊朗革命知识分子 Ali Shariati 曾经称大学是“坚强的堡垒”，用来提供公司企业所需要的知识劳动力。而 Kigoda 作为一个泛非洲研究的机构，会要去打开 Mlimani 这样的堡垒的门吗？有链接知识分子和群众吗？若有的话，可否描述一下如何做到的？

IS: 我想若我说 Kigoda 要开放大学的堡垒，那会有点蠢。用阿图赛的话来说，大学是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而主流知识分子是生产这些主导知识的生产者和传递者，这形成了所谓主导意识形态。

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来说是各种想法的冲突。这让知识比较多元。然而，这样的空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有限制，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空间是被压制的。这个一个斗争的过程，去开启进步的空间。就像其他斗争一样，

>>

这些知识分子努力去想象知识的方法和型态。

这就是 Kigoda 想要做的。或许这让一些知识分子有些疯狂，或许是想得到一些声望，或许是要让整个大学更加进步。总是，虽然有限制，但是那些限制开始慢慢减少了。

人们只可以在给定的环境下作这些事情，我想 E.H. Carr 在 Plekhanov 之后和

来信寄给 Sabatho Nyamsenda <sany7th@yahoo.com> and Issa Shivji <issashivji@gmail.com>

SN: Nyerere 曾经警告使用金钱作为武器的后果。然而，资金显然成为了知识主要的支持。没有研究可以不花钱就可以执行的。甚至很进步的组织也都发现要抗拒资本主义，很难。那 Kigoda 的运作情况如何？

IS: 是的，钱对知识生产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Kigoda 毫无疑问的有资金的问题，但是其也有一定的规则。第一，所有的管理支出，包括薪水、人事费，会从大学预算中来。第二，Kigoda 会避免接受外国的资金。第三，不论资金的来源为何，都不能有附带条件。最后，任何议程和活动会严格受到检视。

这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把预算控制下来，这需要许多自愿的工作和勤奋的努力。

SN: 既然你已经退休了，那么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IS: 再我还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和其他两位教授 Saida Yahya-Othman 和 Ng' wanza Kamata 有个计划，是去写 Mwalimu Nyerere 的传记，这个计划由我国的科技与科学委员会所资助的。我们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接下来要开始写作。

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 Nyerere Resource Centre (NRC) 的成立。这个中心会有一个档案室，而所有的数据都会保存起来，并且让研究者使用。在中心的周围我们会举办活动，并且提供思想交流的平台、辩论、讨论的媒介。我们希望可以今年开始。我个人希望这个中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大陆的思想中心。

我感觉新自由主义，非营利主义，咨询文化等，以及对于政策的注重，这样重视行动，而较为忽视思想的方式，让知识牺牲了。而结果就是对于世界分析的浅薄。我们不可能对于世界没有了解就行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长远的史观。希望这个中心可以点燃这样整体、长远的思考。■

> 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and member of the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Labor Movements (RC44)



由“改变系统而非气候”社运组织所带领的人民对抗气候变迁的游行运动。Herbert Docena摄影。

从 1972 年以来联合国的环境会议在 Stockholm 召开以来，这已经成为了传统。2014 年的人民高峰会则是另外一种会议形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都齐聚一堂。这些人在秘鲁的 Lima 的街道上游行，因为数百名的世界各国代表在一处的军事营区内开会，而该会议就是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的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而“人民高峰会”的诉求则有很多，有些人挥舞彩色的布条，说“我们要求严肃的气候变迁法律”或是“不要多说，做就是了！”。这些要求说明了他们认为联合国会议和场外抗议的人士之间会有可能达到某种共

识，而且那个在 14 公里之外开会得人可能会在现有的架构下制定出严肃的气候变迁法案。

但是，我们更长听到的诉求是“改变这个架构，而不是气候！”的确，这样的旗帜其实也看得到，例如像是“把地球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或是其他的宣称，像是“资本家是凶手”或是“COP 是掠夺者！”这些宣称指出了这里在要求和实际之间有一个很根本的冲突。

这样要求“系统性改变”的作法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使用过了，例如，在 New York 去年 9 月的大游行，以及 Warsaw 在 2013 年举办气候高峰会的时候，

以及在 2010 年 Cochabamba 的出乎意料的世界社会气候变迁运动，甚至在玻利维亚的联合国高峰会出现的社会主义者 President Evo Morales。

在 Lima，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了只要在联合国会议举办的地点，你会看见越来越多的警力去维持秩序。但是在 Lima 之外的警力增加也反应了更大个的一个趋势，那就是人民的觉醒和认同是全球性的，而且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力量与全球生态浩劫的平衡在。而这也显示了全球统治集团松动的迹象，他们可能力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其可以制定规则和讨论语言的能力正在减少，越来越不可能影响

>>

人们的舆论与意见。

毕竟，自从1970年代开始，不同的团体、政府、公司、知识分子等等已经积极的在运做了，虽然有时手段不一，并且也有竞争关系，可是他们都有想要改变这个让人无法置信且不民主的系统。他们已经试图要去解释和宣传全球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不当，并且人民才是有能力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行动者。

而突然之间，后来出现了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全球生态问题，并且谴责霸权和所谓全球一致的利益。他们被迫要投身被分析家所忽略的“全球环境变迁”战场中，抗议官方所代表和所理解这个改变的作法与观点。

透过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知识生产的架构，加上NGO和其他公民社团的抗争，未来20年所有解决的问题，和激进环境主义者不同的是，会是我们常见的标语像是“永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等等，谴责生态危机和市场失灵，或是谴责石油工业。这些都没有触及整个系统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是把资本视为有用的，好得，是可以结盟的。够过每天制度化的实做，不论从计算碳排放到处罚，他们已经慢慢的让人们熟悉这些概念，告诉大家其实敌人不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才是。

总之，全球的统治精英已经试图要去建造一种类似的文化好让人们相信上述这些都是很平常的知识，而只要是反对的声音就是太过于激进和有敌意的。而在很大的成度上，他们成功了。而

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那些要求系统变迁的人已经被视为是极端分子。没错，现在要想象世界末日其实比想象系统变迁还要容易多了。

然而，不论在Lima或是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知名作家Naomi Klein，教宗，其他人等等，都明白表示气候变迁和资本主义有关，并且把资本家看成是掠夺者。这都指出了其实资本主义霸权还是有裂缝，使得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得以展开。

可是，目前为止，Lima的联合国会议显示了，这个运动并没有那么强大，强大到足以抗衡世界上的统治集团。

因为他们否认气候危机其实根源在资本主义这样的说法。那些有远见的企业主也都这样认为，不觉得有危机，甚至反对任何改革。资本主义的先锋们想要控制全球经济，并在OECD，世界银行，大学，政策部门等等都发挥影响力。他们已经有在讨论怎么改变系统了，但是作法就是不要改变。

而被生态危机所威胁和激进运动所影响的统治阶级知识精英在过去30年来已经开始探讨和辩论怎么去从事类似的全球环境管理和管制资本主义。

而过去5年，许多来自发展国家的人已经使用了相同的模式：生态现代化，并透过全球新自由主义管制。要求1)制定规范，让所有的政府都可以约束去减少碳排放，但最终让政府自己去决定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去实行。2)使用市场机制，像是碳交易、税收

等等，企图去把碳的价格提高，让整个资本主义可以转型到低碳的阶段，并投资和使用科技去让事情得到解决。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方法的支持者并没有得到全球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有来自南方的反对声音出现。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这必须要北方精英的支持，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南方政府有太多的反对，反对生态现代化而只持社会民主方案。在这个解决方案中，世界上的国家就是制定出碳排放的上限，然后透过全球重分配的机制，迫使政府可以减少排放量，并且改变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完全透过市场机制。

但是内部的弱点和矛盾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每年都无法或是不愿去抵抗市场的解决方案，无法跟已开发国家说不，所以没有自主性。对于那些反对已开发方案的人而言，协商过程中，许多全球南方的统治阶级也同意了，就是改变系统等于维持现状。

而结果就是那些发展国家的官方已经运作要去建立新的气候变迁的架构，并且明年在Paris签署，于2020年生效。这就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管制。可是这个同意架构不可能改变和减少碳排放，并且提供资源改变生态。我们因此需要新的架构，好让我们可以进步才对。

但是，是有希望的。毕竟，统治阶级的能力是有赖于继续打压反抗声浪的持续性。这个就会需要其他人去推广一个普世的利益，而且要可以解决危机，并且在现

>>

在Lima的示威游行是规模最大的一次。Herbert Docena摄影。



有系统下达成。这些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要牺牲。这样的失败只会让除魅更加严重，激起愤怒和焦虑，而我们看到温和的环境主义者加入出走联合国环境会议的行动，并起接受 72 年的结论，认为那些穿西装的没有办法达成什么严肃的气候法案。

但是是否这个明目张胆的霸权危机会把这样的运动转译到有能力结合其他社会力量上，进而对抗那些精英对于气候变迁的不作为呢？使否除魅和焦虑会变成积极的抵抗呢？这我们不清楚。很大程度上，这依赖于有能力去协商，去调和这个长期的紧张关系，也就是再纳入人民声音的目标和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个目标从来就不是一致的，因为要形成一个更广大的联合阵线，制造压力给那些人，并且批判打倒意识形态和理所当然的知识，我们用的语言却是增加而非批判那些统治理念。若没有去转变那些理所当然的语言，即使有在广大的联合运动，也没办法撼

动，只会让资本主义更加巩固。

所需要的策略是要能让公众加入并且不能减少对于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批判。这样可以让人民去自主改变系统。这会需要一个“大游行”，并且是在 Paris 的联合国会议之后，然后拒绝“人民”是依赖全球统治精英的世界观的。这样一来，还需要不断质疑听起来很进步的那些解决方案，那些认为危机是由国家而非阶级所造成的，像是所谓的碳预算。再者，我们甚至要那些进步、社会主义的政府去拥抱非石油的经济结构。

若要成功把“改变资本主义”放到议程上，那么就要让清楚说明什么是另外的具体替代方案。■

来信寄给 Herbert Docena
<herbertdocena@gmail.com>

> 实践公共社会学

by Ariane Hanemaayer,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Canada



图：Ariane Hanemaayer和Christopher Schneider实验公共社会学的实做。Ariane Hanemaayer摄影。

公共社会学的前提是要投入公众并与之对话，达到相互教育的目的。而有许多有趣的方式可以实做公共社会学。在这篇短文里面，我将要探讨两个实做的方式（数字的例子请见ISA的Public Sociology, Live! 或是在Hanemaayer and Schneider, The Public Sociology Debate的e-public sociology）。第一个实做的方式包括了发展一个社会学家的咖啡馆，称之为周日社会学家。从这里则有了第二个

实做的方式，是类似大学课程版本的周日社会学家，是咖啡店，或称为一毛钱大学，也就是说学费只要一毛钱。这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管道，而对话与交流则在公众间进行，包括学生、店家、知识分子。

2009年我们发起了周日社会学家(www.sundaysociologist.com)，这是从一毛大学所启发而来的点子，希望可以把个体带进来，因为个人有着各种不同的

>>

角度与视野。我们邀请小区成员、大学教授、学生等一个越来一次，来到咖啡馆 (Kelowna,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去辩论各种重要的议题 (国家新闻、影片、政治等等)。目的是要相互的教育，不论是在地或是全球的议题都行。而对话总是刺激许多激烈的辩论，慢慢的也会凝聚、形成意见，社会学家的引导下，可以把个人烦恼和社会议题结合起来。

我们选择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的下午举办。这个安排反应了我们审慎的希望上班族可以加入。我们也在免费的网站上打广告。而每个月的聚会也要各种人的参加，包括大学、高中学生、退休人士等等，还有一位叫做 Brendan 的“吸尘器销售员”和“一般人”。

虽然我们的社会学家咖啡是因为星期日而命名之的，我们希望强调，不论工作或生活、政治或社会，我们都在思考社会学问题。不像是专业的社会学家，公众的生活是社会形塑之或是生活形塑社会。而社会学的想象已经存在了，若是社会学想象可以激发我们周日的讨论，那么其实这样的方式就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周日社会学家也启发了一门大学赞助的课程，还有课程大纲。这个用意是去邀请公众的成员去上社会学的课。每周会邀请一位社会学家来上课，以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小组讨论，学生人数最多 30 人。而课程和每一位讲师都会透过大学而进行广告，或是利用社群媒体，而每周都会有 100 人左右参加。社会学学生和公众会打散到各个小组，好进行对话。然后会和讲师和助教一起合作讨论，激发大家的社会学想象。

有不少人会固定参加周日社会学的人。

大家的反应都很热情！例如，吸尘器销售员 Brendan 说：“有办法可以参加这个讨论和感到有趣，并且有所贡献，那是我最大的动力来源，我从会有过这种经验！”另外一个人说：“这种课程实在是个特权啊，我很荣幸可以参加，我都快 80 岁了，很高兴可以跟年轻人讨论议题！”

这些反应促使了我们要更进一步思考我的社会学的信念和专业。有一个最常见的两难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把复杂的社会学概念讲得清楚和明白。我觉得在我的专业之外，这也是我要努力的地方。这是一个绝佳的公共教育经验。那里有许多公共的支持，我们也觉得有受到鼓励去发现更新更有创意的公众介入方式。广大的脉络是非常有帮助的。

Kelowna 是一个富裕的退休人员小区，是 British Columbia 很好的居住地。许多参与周日社会学家和公共社会学课程的公众都是退休人员，有大学学位。例如，Joyce 是一个规律的参加者，说道：“我大学修过社会学，那在 70 和 80 年代，我都忘了是什么样了，这个机会重新点燃了我对社会学的热情！”此外，若是类似的形式举行在劳工阶级的小区，那想必挑战会很大。我们这样的课程是默认多数人有计算机、网络，而且平常有关新时事，收听广播，而有点左倾，对于公共事物有兴趣！社会学家们若希望举办类似的课程，那么可能要考虑各种其他的人口结构组成因素，并把在地的脉络也纳入考虑。■

来信寄给 Ariane Hanemaayer <ahanemaa@ualberta.ca>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cschneider@wlu.ca>

> 重新夺回都市

智利的社会运动

by Simón Escoffier, Oxford University, UK



图：在Santiago的Villa Francia一处争议性小区。“组织起来反抗，赢得胜利”。由Nathalie Vuillemin摄影。

尽管智利有很长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可是自从1990年以来，都市贫穷问题被理解成是一群被社会隔离的人在政治上很被动。我的研究是着重在Santiago的Peñalolén地区，而我想要论证的是，至少在我的案例中，都市贫穷人可以组织动员，并反抗政府的政策。

David Harvey (2008: 23) 定义都市权利为“透过改变都市而改变自己的权利”。若把都市化和资本主义连结在一起，从学术上来看人民的财产权，Harvey认为人类应该要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去重新形塑都市化的过程。对于贫穷社群来说，执行都市权利包括保卫都市居住权，并且可以使用设施和资源，抵抗都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化。

主流的学术解释是说，透过持续的集体动

员，智利都市贫穷已经得到了都市权，不过虽然有些时候比其他时候来的成功。住宅集体行动则可追溯到1920年代。和政党以及其他机构联合，所谓的“居住者运动” (1) 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们对政府施压争取权利。在1957和1970年之间，土地占领变得越来越多，重新改变的智利的都市形貌，特别是Santiago。事实上，1972年的时候，也就是Allende的政权，16.6%的人口居住在非正式住宅区 (Santa María, 1973: 105)。

那些非正式住宅区是左派团体的地区，所以许多住宅区因此被军政府镇压 (1973-1989)。许多地方的草根抵抗很持久，也是对抗威权体制的重要力量。

1990年之后，当智利民主化以后，居住者运动的研究消失在学术届了。虽然许多研究中

心研究 1980 年代的集体动员，像是 University of Chile, PUC, CIDU, SUR, Flacso,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等等，但是在 1990 年代，学术界开始关系去动员化，而非集体行动。他们把那些非正式地区描述为非法活动的温床，毒品和其他问题丛生的地方 (Hipsher, 1996; Tironi, 2003)。

Santiago 的东部 Peñalolén 地带，就像其他的智利都市一样，提供了反例。事实上，Peñalolén 的小区已经系统化地进行了集体动员超过 25 年，诉求的不只是权利，还包括更积极的改变都市。

无壳蜗牛人民组织要求居住权利，而有 900 户的移入家庭从 Peñalolén 的各地而来，占领了高房价地土地，主要在东部。在 1992 的冬天，Esperanza Andina 成立，这是第一个智利民主政府的土地占领，透过很强的社群组织，拒绝政党和政府的收编，Esperanza Andina 要求在都市地区建造社会住宅。而许多年的抗争、冲突、协商之后，居住者得到了土地权，合法化了小区，并且取得了盖房子的许可。

而 1999 年的 7 月，持续的住宅需求和居住者拒绝搬迁到都市外围的抗争导致了 Peñalolén 另外一波的土地占领运动。有名的“Toma de Peñalolén”是最大的占领行动，包括了 1800 户家庭，该行动施压政府去提供社会住宅。虽然 Toma 的组织后来分裂了，排除了激进组织加入协商，多数人最后还是取得居住权。

Peñalolén 对于社会住宅的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从 2006 年开始，左派草根的无壳蜗牛抗争运动 (MPL) 已经协调了地方的住宅委员会，要求社会住宅的权利。

Peñalolén 的事件已经显示了社会住宅的抗争运动可以是都市贫穷人口取得权利的方式之一。而 2009 年的居民草根组织也知道新的都市更新计划要实施了。改变了土地管制措施允许建筑物建造，包括了新的道路，让交通更方便，并新引新的店家进驻。而新的计划目的是要去使土地价格上涨。此外，这个计划并不包括足够的土地去满足住宅的需求，虽然有些小区认为这样的计划很好，但是多数的草根团体拒绝这种缙绅化的政策。那些团体抗议新的政策，要求公民投票表决。2011 年的 12 月底，这个计划被投票否决了。这保护了该区域，贫穷人家得以保留居住地，毕竟他们已经住在那边 30-40 年了。

Peñalolén 的东部地区称作 Lo Hermida，已经在过去 25 年来发展了很强的集体动员文化。而利用这样的集体社群价值和认同，这些地区开展出了不同的方式去重新整合地方，因为在过去这些地方是被其他势力所收编的。例如，

居民组织了音乐工作坊，或是其他活动，作为重新夺回这些地区的方式。

Peñalolén 历史地聚集了集体的事件，这响应了许多其他智利都市贫穷的问题，以其怎么取得城市权利 (Sugranyes, 2010)。这样的过程显示了智利都市的贫穷群体是有能动性去变得有影响力，进而集体行动，争取权利。■

来信寄给 Simón Escoffier <simon.escoffier@sant.ox.ac.uk>

References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3-40. Retrieved from <http://newleftreview.org/II/53/david-harvey-the-right-to-the-city>.

Hipsher, P. (1996)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8(3): 273-297.

Santa María, I. (1973) “El desarrollo urbano mediante los ‘asentamientos espontáneos’: El caso de los ‘campamentos’ chilenos.” *EURE* 3(7): 103-112.

Sugranyes, A. (2010) “Villa Los Condores, Temuco, Chile Against Eviction and for The Right to the City”, pp. 145-148 in A. Sugranyes and C. Mathivet (eds.) *Cities for All Proposals and Experiences towards the Right to the City*. Santiago de Chile: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HIC).

Tironi, M. (2003) *Nueva Pobreza Urbana, Vivienda y Capital Social en Santiago de Chile, 1985-2001*. *Revista de Sociología*. Santiago: Predes Editores.

> 乌拉圭的非法住宅的政治

by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Bogotá, Colombia and Board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RC21)



图：在Montevideo的非法住宅区越来越多。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摄影。

过去20多年，Montevideo改变了很多，而在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影响下，乌拉圭的首都也越来越不平和隔离，或许最明显的就是非正式住宅区的增加。

Montevideo的非法居住地区在质上和量上都有很大的转变。非法侵占地区扩张得很快，但是很矛盾的是，他们也渐渐得变成有规划地侵占。结构的因素，像是持续的去工业化、财产减少、低工资等，都或许更直接影响了这个转变。不过，整体图像还是不完整的，而且我

们没有好好检视政治的角色和经济的转变，还有民主化和选举竞争的因素。

虽然许多人认为非法侵占是出自于个人意愿，是经济因素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仔细看看Montevideo的案例会发现，组织和政治网络是有其重要性的，并且为了响应政治机会结构，这个因素相对更加重要。

在拉丁美洲，国家和政治的力量形塑了非法住宅区，也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因为这个关系比以前都来得强。可是Montevideo的案例

>>

却不一样。虽然土地侵占 (cantegriles) 在 1940 年代偶有发生，但是乌拉圭的首都有能力吸收了多数的农村移民，特别是在工业化时期。甚至在 1980 年，尽管都市不平等的警钟已经响起，Montevideo 仍然是相对平等的地方，在经济和空间上都是如此。

但在 1990 年代，非法居住区开始扩张开来。1999 年，Montevideo 的一半的非法居民是小于 15 岁的，而大约三分之一是从组织性的土地占领而来。有些事计划好，甚至有乌托邦的想象，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早期的移民的确想要比满足基本需求更多的东西。大致上来说，从左派领导的观点，这种非法占领有着草根土地改革的想象，批判政府的住宅政策。其他的政治人物则也帮助非法移民建设房子，规划道路和公共设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像是学校，健康中心，合法化等等。非法住宅区或许是最近政治上最热门的议题，也是乌拉圭穷人的政治行动。这就像 Portes 和 Walton 在他们的 30-40 年前的书 *Urban Latin America* 中所描述的一样。

这个转变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这里的问题特别有趣，因为 Montevideo 还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人口成长，农村移民总是会在各种非正式地区屯垦，但鲜少在都市。许多 Montevideo 的非法移民都是从城市来的，并且被迫移动，特别还在他们组成家庭和失业的时候。租金的涨价也是推力之一。

可是，经济因素不能解是为什么有些群体和家庭会决定要去非法侵占，也不能解是为什么是在某个特别时间点。例如，为什么不是在 2002 年的经济危机时去侵占呢？政治和选举中介了这个 Montevideo 新小区的形成和巩固，特别是在规划区。乌拉圭独裁统治的结束和左派联合阵营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是第三势力，也有选举的实力，最后也赢得了 1990 年 Montevideo 的市长选举。并且扩大了其他阵营对于侵占区的包容和支持。

许多非法住宅的领导人在 1990 年代和不同政党的政治人物有连结。虽然多数都坚持“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却政治得很。过去的小区领导人或许会和 Colorado 政党结盟，因为公共工作部长是 Colorado 党的。可是他们也和 Frente Amplio 党有良好的关系，也提供了可非法侵占的信息，并起同时也试图在 Blanco 党的人来访时要营造好的形象。

然而，很快地，所有城市的居民开始知道什么是必须的住宅问题解决办法，或是怎么让政党可以得更多选票，或是怎让服务的提供可以变贵，而且特别是在之前的非法住宅区。市

政府和政治人物都知道这个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土地侵占的事件数目并没有在 2002 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暴增。这也是为什么总统 Mujica 要在 2011 年公然驱离那些居民。此外，选举竞争本来想争取穷人的选票，却在 2009 年之后左派第二次执政之后，也不再继续了。

虽然 Montevideo 的土地侵占或许有点太短了，但是结果却影响且持续了很久。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在好转，asentamientos 还是很贫困，没有基础的设施，有很多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贫民窟的改建计划也扩张到许多地方，可是还是有限制。20 到 25 年或许不能轻易地被取消的，整个世代的小朋友若在这种地区长大，被隔离的经验还是会有污名，会影响到后来的人生。

然而事情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公共公园已经被建造在特别的地区，邻近那些非法居住区。新的住宅计划也已经开始执行了，免税让私人的社会住宅公司有更多的动力去加入计划。住宅合作社也增多了。可是，让非法居住区可以纳入社会住宅的挑战仍然存在，也是 Montevideo 要面对的课题。■

來信寄給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majo.alvarez.rivadulla@gmail.com>

> 巴西

无壳蜗牛工人运动

by Cibele Rizek and André Dal'Bó,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Brazil



图：MTST在São Paulo的大游行。

巴西的无壳蜗牛工人运动 (MTST) 在 1990 年晚期展开，诉求是联合“工人、失业者、和百万无家可归的巴西人，他们住在危险的房子里面，在都市的边缘，没有安全，也没有保障。”现在巴西的都市政治非常有活力，而 MTST 也组织了许多抗议活动，让巴西社会搅动翻滚，而且其动态的组织也提供了政治辩论的一个观点。

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和以往的住屋者运动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后者在 1980 年代兴起，

并且和政府所领导的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PT) 运动是联合的。但虽然 MTST 一开始是所谓的无土地运动 (MST)，无壳蜗牛工人运动后来出现，并在 1997 年的国家人民大游行之中产生。那时后的无土地运动者是从事 Oziel Park 的都市占领，那在 Campinas, São Paulo 州。第一个 MTST 的占领运动叫做 Anita Garibaldi，是 5 年后在 Guarulhos 所组织的。

自从第一次的占领，MTST 已经组织了至少 10 次的占领活动，包括了 São Paulo and

>>

Campinas, including encampments called Chico Mendes (Taboo da Serra, 2005); João Candido (Itapeceira da Serra, 2007); Frei Tito (Campinas, 2007); Jesus Silverio (Embu das Artes, 2008); Zumbi dos Palmares (Sumaré, 2008); Dandara (Hortolandia and Santo André simultaneously, 2011); and the Novos Pinheirinhos (Santo André and Embu das Artes, 2012)。

2013年6月，巴西历经了很紧张的抗议过程，这使得长期的人民抗争连结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其实并非偶然，MST非常活跃，而且每天都和私人开发商产生冲突，也和不动产业者、国家起冲突。此外，长期的街头抗争主要发生在2013年6月和2014年8月，MTST的占领运动包括了废弃闲置的土地和建筑，规模迅速扩大，从São Paulo到他的都市地区。而超过100场的行动出现在过去1年之中，相当惊人。

巴西其实对于住屋的短缺相当头疼，而且都市的负债也从2011到2012增加了10%。有数以千计、万计的巴西家庭被驱逐，那是因为土地价格的飙涨，房地产和租金的过高，以其房地产市场的暴增。这个房地产的负债使得巴西政府设计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住房计划，和其他的社会计划一起，这个计划叫做My House My Life (MCMV; Minha Casa Minha Vida)。这让经济起飞，制造工作，并且让低阶级可使用以往无法使用的消费和设施。讽刺的是，这些社会住宅也增加了都市的居住隔离和排斥，并没有帮助巴西的都市中心穷人或是边缘的那些设施。

在这脉络下，无壳蜗牛的工人运动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巴西的都市政策使然，所以运动的快速成长也连结到了政府的社会住宅计划，而且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工作的协商已经让运动同时都变成了政策辩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

这个矛盾性可以被看成是最明显的运动成果之一。一旦MTST的职业开启了协商机会，则市政府会被要求取得被占领的土地，而且很快地MTST可以要求家庭成员的纳入社会住宅计划。可是新的社会住宅或许也会造成隔离，因为新的社会住宅主要给穷人，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建构在都市边缘，让不平等更恶化。

MTST也发现这个矛盾性。即使运动者是协商者，而建商是政策执行者，街头的抗争还是持续进行中，抗议暴力的驱逐、逮捕、甚至伤亡。因此MTST运动继续扮演着把巴西社会政策的隐藏面揭发出来的角色，也就是不正义的都市政策，半吊子的社会计划，不断的冲突和抗争。而且，或许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关键的巴西社会运动，MTST体现了希望，体现了巴西都市更平等和公平的未来。■

来信寄给 Cibele Rizek <cibelest@uol.com.br>

> 南非穷人的抗争

by Prishani Naidoo,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图：在Soweto的Orlando居民抗议其2010年世界杯的建造计划所带来的影响。Nicolas Dieltiens摄影。

南非主导性对于非种族的选举强调政治制度的成功，政治人物，政策，过程等。然而，非正式政治制度还是不断地影响着政治，或许最明显就是抗争政治。这是在政党、工会、组织等制度之外产生的，穷人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起行动。

这种非正式场域的政治斗争有特别重要之处，因为那些地方其实都是被设计来把黑人隔离起来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想象成是为了要把黑人永远囚禁在社会底层，

然后避免他们“制造麻烦”。毕竟，这样就是为了响应黑人非法在都市中寄居，使得许多政策必须要设计来控制黑人的移动，这就像是廉价劳工的限制移动一样。这包括了非正式城市的建立。但是也是从这样的地方产生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以及争取更好生活的反抗。

今天，也就是在20年后正式的废止种族隔离政策之后，非正式的政治继续影响着多数南非穷人的生活。其实种族隔离还是存在着。这也是为什么从1990年之后，至少在每年

冬天（但逐渐变成是一整年），穷人和那些非正式小区的居民会到街上或道路上去抗议，争取基本的生活条件，包括水、电、基本房子。这已经变成了常态。这是在2000年开始扩张的，然后到了2004年有更大的规模产生。

早在1997年，孤立的类似事件已经产生，是发生在穷人地区，他们抗议他们的住宅没有水电。而接下来的3年中，这样的报导变成了更常态，因为穷人小区面临到的私有化的剥夺权利，以及失业的威胁，还有劳动弹性化的

>>

影响。而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其实是 ANC 政府在 1996 年的政策。断水和断电以及驱逐居住地等事件不断发生，而都市也要求居民要付费使用这些基本设施。受影响的居民聚集在一起，拒绝这些对待，然后上街抗议。他们的抗议包括了游行、拒绝政府人员进入小区、毁坏公共财产、私自接上水电等等。这些抗争开始和其他的社运者联合，并且把“新自由主义”当作是共同的敌人。

2001 年以前，抗争运动和批判路线包括了诉求“新社会小区运动”，重要性在于他们是第一个在 1994 年之后的运动，并且是在 ANC 政府的对立。有一本 2002 年出版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叫做“*We are The Poors*”，由社会学家 Ashwin Desai 所说的新的政治主体的诞生，poors 就是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和学生、知识分子、运动者一起，抵抗 ANC 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化。

而 2004 年，许多这些运动已经进入了下滑阶段。国家迫害所累积的影响，组织间的政治角力，以及资源使用的困难，种种因素都让情况更恶化。在许多案例中，国家对于运动的响应使得运动瘫痪了。可是讽刺的是，2004

年是一个有更大规模抗争的一年，许多都是之前 2000 年早期时的运动的影响。非正式的政治可能还是会侵入，可是政府的响应已经失败了。

在许多案例中，一旦居民用尽了所有官方的管道但也没有下文的时候，抗议者只能被迫走人。在一个案例研究中，名为 *The Smoke That Calls*，由 Karl Von Holdt et al. 在 2011 年出版，抗议者认为有些时候唯一得到注意的方式就是去把东西烧了，或是烧轮胎，产生烟，好让政府知道。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让媒体越来越常使用“暴力抗议”的字眼。而同时，警察的行动也越来越暴力。2009 年报纸就报导了至少有 43 个抗议者被警察打死。

今日的抗争也总是被链接到地方结构的差异上面，像是 ANC 和其形成。这个被视为是 ANC 成员的动员运动，是反对其在都市被选出的领导者的。有些结果其实是政府败退了，有些时候则是批判政府的政策，并且得到资源，像是工作或是补助。接下来若是看看新的政治组织像是经济自由斗士 (EFF) 和联合阵线 (国家钢铁工人工会) 怎么和在地斗争连结起来。

虽然政治人物试图去

把注意力引导到形式政治的领域，像是国会或是政党，可是非正式的政治还是持续进行着，并且着重在地方的层次。这是改变的机会所在。然而有很多事情是取决于集体的信念，也就是集体地去想象一个不同的政治。■

来信寄给 Prishani Naidoo <Prishani.Naidoo@wits.ac.za>

> 赞比亚： 没有反抗运动的驱逐 压迫

by Singumbe Muyeba,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图：当总统在讨论驱离政策时，小朋友就站在废墟中(Chinika, Lusaka)。这是由赞比亚国家军队所执行的。Emmanuel Tembo 摄影。

2013年4月，15辆武装的警察车进入了Lusaka West，把居民叫醒，然后赶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情发生。警察摧毁了33间房子，大约365人无家可归，他们已经在那边住了20年了。有些驱逐者甚至是低阶的警察。驱逐行动并没有通知，而Lusaka市政府法法院的核准也没

有。在驱逐之后，那些高阶的警察占地为己有。在那个月，有更多的人被驱逐。5月15号有被驱逐的家庭走上街头抗议，走向副总统的办公室，但是被拦下了，然后被赶走。他们没有警察的允许，这是公共秩序法的规定。而为什么这一连串事件没有导致社会运动的发生呢？以下我试着解答这个问题。

Lusaka West的案例只是许多案例的其一而已。驱逐行动包括了数百的住户。2014年在Kanyama就有14间房子被摧毁，Chinika则有100间，Mikango Barracks则是许多人被驱逐。而摧毁住宅的政策是针对那些非法民宅而来，这是2007年政府的法令。而Patriotic Front政权从2011年上任至今，

>>

已经驱逐了許多人，特别是 upgraded squatter settlements。而摧毁的过程也并不合法，并且很多案例中，驱逐都有人伤亡，这是严重的公共议题。

这个情况对于社会动员来说是很适合的环境，因为有 70% 的都市人口居住再贫民窟，而这个意味着只要有类似的居住地的都很容易就会人口超过。而整个国家也有很长的抗争历史和传统。

但是，我们要怎么解释抗争的缺乏呢？第一，政治精英的不宽容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起始于 1955 年的公共秩序法案。这个法案是英国殖民政府所制定的，为了要控制那些反对运动。而后来的总统并没有取消这个法律。总之，这个法律要求抗议者要提出申请许可。他们只能在抗议的 7 天前申请，而且通常不会被允许。此外，这个法律并没有承认非法居民的抗议权利，所以即使居民住在某处很久了，不管怎样抗议都是违法的。

政治精英的不作为并不只是保守而已，他们还害怕没有被允许的抗争后果。公共秩序法的违背通

常会导致警察的暴力，并且还会让那些居民受到惊吓。例如，Kampasa 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有一群被驱赶的居民在机场附近抗争，但是有两人被射杀，一人受伤。这是国家暴力。我的访谈者 George 也担心最近的驱逐和歧视会更加严重，即使他们有拥有居住的证照也照样会被迫害。当我问说他们会怎么办的时候，他们都说只能放弃，到别处去。

政府和公民社会也没有办法保护潜在的被驱赶者，这是因为有限的金钱资源而导致的后果。而居住权力也没有按照 Mwanawasa 总统所宣称了那样在宪法中被明确制定，他那时宣称政府要确保这个居住权。所以，政府公开地拒绝了补偿那些被驱赶者。总之，政府不但没有提供资源改善居住问题，反而迫害了人民。

公民社会也没有经济方面的资源来保护非法居民免于被驱逐。虽然赞比亚有 Land Alliance 和 Homeless International，他们组织了 People's Process on Housing and Poverty，这个组织宣称主要是对抗驱逐的公权力，但

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组织常常没有去动员小区或是处理那些土地争议，虽然公众希望他们这么做，可是资源不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Zambia Land Alliance, 2014, <http://www.zla.org.zm/?p=9>)。2010 年，对于贪污的控诉让民众对于流向政府的补助产生了质疑，让许多计划停止了两年多。所以，这些组织有时候只有做出声明，但是却并没有彻底处理。

总之，对于 Lusaka 正在兴起的反驱逐运动和赞比亚的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的两个挑战是，第一，对任何形式抗争的公开敌意。第二，政府能用来解决居住问题的有限的金钱资源。一旦人们开始被驱赶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抗议也就沦为没有目的了。只有法律上对于公共秩序的改变，以及经济的成长可以提供给这些运动继续茁壮的希望。■

来信寄给 Singumbe Muyebe
<singumbe.muyebe@uct.ac.za>

> 创新实验室和黑客空间 新形成的文化

by Isabelle Berrebi-Hoffmann, Marie-Christine Bureau, and Michel Lallement, LISE-CNRS,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28

图：典型的黑客空间。(Michel Lallement摄影。)

一种新的分享形式正在形成中。这也是一种新的合作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并且对于现在的经济型态提出疑问。创新实验室和黑客空间是特别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脉络下，公共利益所以引发的经济是以使用而非产权为基础的。这个集体的制造空间在 2000 年成立，引进了一种新的工作伦理：制造的文化 (maker culture)。这样的空间有不同的名字，像是创新实验室，黑客空间，制造空间，生活实

>>

验室，科技小铺等等。他们是一种重新发现把各种事物放在一起而制造出乐趣的尝试，写程序，或是想象新的穿衣或是烹饪型态。全球的大城市都很欢迎这种空间，因为这同时鼓励了新的生产、合作、消费、学习的形式。

3D 打印机是这种空间的中心，因为它可以让生产出任何东西，而且只要透过网络上的设计图就可以打印了。虽然成品有待改进，但是进步得很快。许多这些的空间也有专业的社会，像是数值控制仪器如雷射剪裁机等等。几年以前，使用这种设备需要数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可是现在只要数个小时就可以。此外，机器的价格和设计软件的价格跌了很多。所以，就像个人计算机一样可以让我们在科技世界中悠游其中，创新空间可以让我们更自在地在物理空间中生活。

可是，即使这些空间分享了共同的价值，在 Barcelona, Berlin, San Francisco, Paris, Beijing 等的空间却不尽相同。创新实验室是 MIT 所发明的，成立于 2000 年早期，有着全世界的网络。黑客空间则是另外的故事。其源头是加州，可追回到 1970 年代的 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群人聚在一起研发创新。许多结果免费被分享出来，包括了 Steve Job 和 Bill Gates 则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黑客中心则一直有黑客的精神，在组织的方面则和创新实验室很像。即使写程序对他们来说是很专业的，黑客空间则也有一定的配备可以生产东西。此外，就像创新实验室，公共存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为了让这些空间不要指给特定的研发创新使用，还可以及体分享和学习知识。

创新实验室的运作是以一个网络型态的新型生产生态系统为基础的。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也是一种摆脱资本主义的前卫行动。但是我们不能走得太远，好像以为这真的是美丽新世界。这些空间拥有许多创新的科技、政治、组织型态，虽然他们是主流经济的边缘人，但是其成功是代表社会、文化的转变，也代表人们新的思维、设计、工作、生产、行动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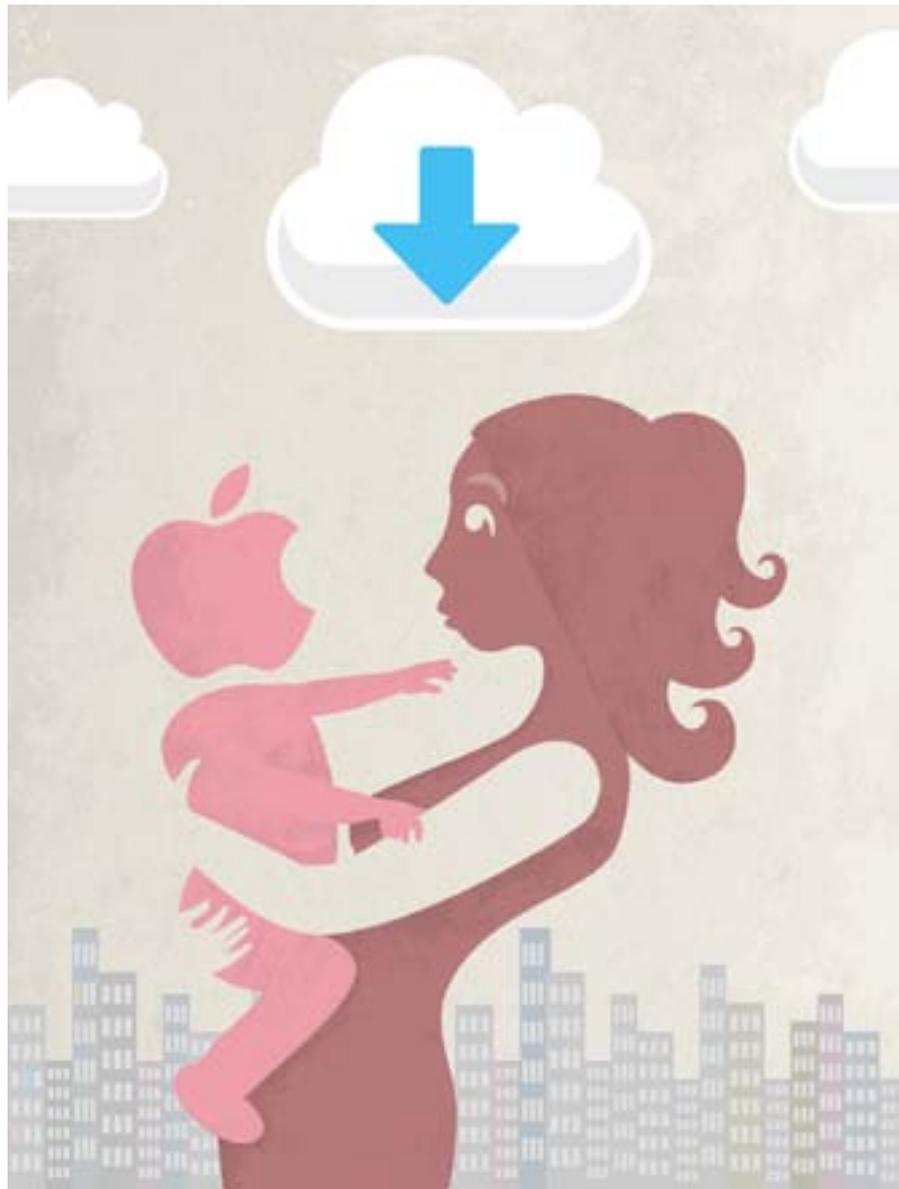
社会学家有人已经研究这些新的生产方式，虽然这些空间很不一样，可是有着共同的组织模式，这些是从黑客社群中而来的。而这些开放的文化也带进了新的生产和合作模式，有赖于平等的网络结构。这也发展出新的分享成果和服务的方式，像是 Copyleft 执照 (1)。而这种创作的运动也从传统的批判工业社会思想中得到灵感，William Morris 就是设计界中这种想法的先驱。

最近我们进行了对于北加州的黑客空间的访问，显示了这些空间都是由年轻的白人高教育者所组成，大约 30 岁左右，这些空间也有许多 Google 的工程师，对学术不抱持期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当黑客，然后用计算机创新，生产新的产品，甚至创造新社会。有些成员积极地在 Silicon Valley 进行实验创新，而其他更激进地投入社会运动，像是 Occupy 运动。在这结构危机的年代，我想我们是很值得研究这些空间的，这是真正的乌托邦，有着新的工作方式，决策管理、消费、生活的风貌。■

来信寄给 Michel Lallement <michel.lallement@cnam.fr>

> 在多元能动的社会中追求性别平等

by Bernard Fusulier, FNRS,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and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CNRS-LIS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图：工作场所中有问题的性别政策。Arbu 绘。

女性下降的生育率，上升的失业率，以及母职的忽略，这些都让社会风险提高了。虽然金融危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对于性别平等来说特别有害，让家庭工作的不平衡更加严重。

政策制定者报告了越来越多人知道女性是个重要的角色，帮助巩固社会。女性被认为在劳动和家庭都是重要的，这种双重身分减少了制度的缺陷和不平衡，并且确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新的全球共识承认了多数人希望可以照顾小孩和其他需要被照顾的人的同时，可以兼顾事业。他们希望支持这个双重需要，但是没有质疑现金性别分工的基础，因为这个分工预设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立场。结果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意帮助父母去取得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第一眼我们会发觉，公共的诊断似乎是性别中立的。重点在于就是要所有人都有工作收入。所有的福利国家中，或是那些正在建构福利体系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策扩张，针对平衡工作和家庭而来，包括了税制的福利制度的改革，还有幼儿照顾的系统，此外，平衡专业与家庭生活也是重点。

>>

而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有个转变正在发生，特别是在政策的实行方面。尽管有着性别平等的修辞，那些所提出的政治方法都在实践场域里失去了中立性。父母和家庭走向每一个人变成了是支持工作母亲的方式。减少所有人的工作时间是透过许多女性打工的结果。而生育假的长度也应该要包括父母两方。换句话说，核心的政策概念就是要针对女性而非男性和父母，因为女性将来都会成为母亲。2014年的10月，Facebook和Apple就公开承认，要提供女性职位，好对抗这个由男性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并提供可以帮助生育和巩固家庭的方案。

这个图像反映了改变家庭结构的抗拒，改变那些帮助工作家庭的方法。此外，维持母亲的工作也便成是一个真实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许多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烧时，更是需要。而这也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女性需要以离职为首要考虑，以及生理与心理上是否可以平衡，而这样的实践是否符合社会正义。

而要调解专业与家庭生活是距离女人还很遥远的。我们开始问了一个很理论的问题（怎么帮助父母去平和

工作和家庭），但是我们只提供了一个方案（期待母亲去赚取更多钱，但却没有改变基础的分工不平等）。

继续向前的话，动员必须从批判和重构组织与制度的基础开始，重点在于薪资为基础、19世纪社会结构和20世纪的福利制度。我们必须质问那些已有的社会安排和解构以这些为基础的实践。我们必须质问社会契约中的性别关系。也就是以生产回中心的世界预设了原子化的生产者，并需要由照顾者来支持。这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型。我们也必须解构生产和再生产的分割，以及相关的性别化实践。

若我们严肃看待这些宣称，我们可以开始去考虑另外一个社会的可能，开始去以新的参考框架去看待世界，把社会转变成“多元能动”的社会。工作可以被重新想象成和其他活动有关，并且用社会投资的角度去评估工作，这些活动也不会是霸权或是只限于特定的性别而已。不活动或是没工作就会变得比较少见，然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将不会成为女人的负担。

这个转变需要新活动的进步建构，而“积极的”状态将不会被定义成狭隘的有

工作而已，而是以更包容的工作、包括照顾和劳动等，来定义何谓积极。从这个观点来说，社会将不会只是注重再有给劳动而忽略非市场型态的工作。反之，我们会向前行，迈向更宽广的工作概念，强调并肯认各种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人类共善的贡献。■

来信寄给 Bernard Fusulier Bernard Fusulier <bernard.fusulier@uclouvain.be>
和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drancourtchantal@hotmail.com>



工作中慢性疾病的協商

by Anne-Marie Waser, Dominique Lhuillier, Frédéric Brugeilles, Pierre Lénéel, Guillaume Huez, Joëlle Mezza, and Cathy Hermand,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在法国，让工作年龄的人口都有工作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因为整个社会已经高龄化，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而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加上医疗的进步，早期诊断出来的人都会存活，但也越来越多人被诊断出有慢性疾病。几乎 1.5 千万的年轻人都有慢性病，大约是 20% 的总人口。

病友团体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呼吁要支持那些和疾病与残障人士住在一起很久的人。可是，负责的单位虽然研究许多疾病（肝炎、爱滋、癌症、硬化、糖尿病），但是也开始需要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他们也有兴趣知道更多慢性病友的工作状况。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我们发展出了行动研究方案，让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一起去研究：a) 什么样的状况下，慢性病人可以照常工作；b) 介入去提供病人资源以及支持其工作。

这个行动研究方案在法国的 3 间公司执行。而过去 2 年半的时间，我们研究了那些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慢性病人，或是

想要继续追求人生理想的人，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资源（照顾、老师、小区工作等）。为了了解这个社会状况，我们考虑了三个阶层的主题对象。第一，在人力资源和管理的方面怎么和工作场合的健康与社会议题有所关联。第二，负责管理慢性病人离职、续留、请假等等的人员。第三，那些回到工作场所的慢性病人和同事。我们分析了所有和这些有关的人，包括他们的生活、家庭、环境、小区等等，再者，我们也问了他们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拥有的资源等等议题。

我们的研究并不局限再那些被诊断出有慢性病的人而已。我们也进行比较，比较那些没有慢性病的人，包括同事、管理阶层等等，看他们怎么互动。为了要得到补助的资源，管理阶层都会要求慢性病的证明，并评估。重要的是，却有多数慢性病人没有申请这些补助资源。只有 250 万的人申请慢性病证明，但却也有 990 万的人有资格申请。我们也看有证明的病友真的可以得到什么，试图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

“Only 2.5 million people request certificates of illness, although some 9.9 million could do so”

不申请。

结果显示了那些申请慢性病证明和领取政府补助的病友可能会有污名，被认为不公平。而这个证明的审核其实是很严格的，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把关。不过，他们比较不了解工作的环境，因为同事和老板可能会被排除在审核协商程序之外，影响到整个补助的结果。再者，第二个障碍是确实地执行这些补助评估，人力资源或是健康服务等等从上而下而来，却没有考虑到工作环境的动态关系。所以，这些方法通常忽略了非正式工作制度。而用互惠的原则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分析之中，我们看到了工作环境是比较少类似争议的。此外，互惠的案例中包括了个体和集体的行动。总之，在地的制度是镶嵌在特殊脉络中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成功的补助案例，也就是没有污名的那些案例，有几个相似之处，他们是法律评量和在地制度的配合，也有当事人的参与，而补助就是这种多向的协商结果。这样一来，社会行动者是都会支持整个补助制度和对慢性病人有益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证明的正当性和相关的权利，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病人该有的权益。所以，这些考虑之下，行动可以开启地方的互惠环境，让补助的给予者和接受者可以超过个人善意、帮助、补偿等等的限制，我们也发现病友团体也提供了机会去参与其中，转变工作环境。最后，他们也让个体可以定义疾病的意义，建立自我认同，把个人处境带到真正的集体权利领域。■

来信寄到 Anne-Marie Waser <anne-marie.waser@cnam.fr>

> 庆祝印度尼西亚的民主

by Lucia Ratih Kusumadewi,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RC22) and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



图：Jakarta支持Joko Widodo和Jusuf Kalla的群众，

“大家好！耶（胜利手势）！别忘了投给 Jokowi 喔！”Slank 是知名的摇滚乐团，于 2014 年 7 月 5 日在一场造势活动中带动欢乐的气氛，并要大家支持总统候选人 Jokowi 和副手 Jusuf Kalla。这场造势活动有数万名的支持者到场，年轻或年长，男与女，贫与富，聚集在一起大声欢唱。而稍晚，大家等待的人终于出现了：

Kokowi 站上了舞台中央，和支持者挥手见面。整场的气氛瞬间到了最高潮，大家呼喊“Jokowi! Jokowi!”并比出胜利的手势。

今年是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选举中看到了“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愉悦的热情非常激昂，无数的人都参加了选举造势活动，并头数选战，而总共的

>>

选举募款也高达 295 亿印度尼西亚盾。而选举当天，在选举当天，因为先前的选战大多拒绝金钱政治的游戏，所以人民也非常关注并监督是否有选举舞弊产生。

这是印度尼西亚民主的崭新一页。这个转变事关重大，之前的黑金假民主和权力垄断，到现在的改革、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以往的政治精英都失败了，因为选民不再买单。我们已经看到了因的政治文化正在产生当中。

而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少观察家预测到这个转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着这么长久的贪腐政治历史。显然地，所谓的“Jokowi 影响”是一个转折点。不过特殊的环境是促成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时间点上，大家传递讯息说“现在正是时候！”也就是说是时候改变了，要终结混乱、贪污、垄断权力的政治。

Joko Widodo，也就是 Jokowi，已经变成了过去两年来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是 Central Java 的 Solo 市市长，大家认为他工作勤奋，诚实。大家也喜欢他具有人性的政策，打击贪腐，并打 Solo 打造成旅游的中心。2013 年 Jokowi 被 City Mayors Foundation 认为是市长排名的第三，而 2014，Jokowi 的名字在 Fortune 上面被称为“当今 50 大世界领袖之一”。

Jokowi 在 Solo 的成功让他成为政治新星。他也被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斗争党 (PDI-P) 所提名，该党是主要的反对党。后来 2012 年他赢得了首都 Jakarta 的选

举，和副市长 Tjahaja Basuki Purnama (Ahok) 一起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像是洪水控制，塞车控制等等，这都是之前被忽略的议题。此外，他们也进行都是规划，健保，教育等改革。

而 PDI-P 提名 Jokowi 为总统候选人，和 Jusuf Kalla (JK) 搭档竞选。JK 是 Golkar 档的老手同时也是副总统，其竞选主轴是是要开启印度尼西亚的“心灵革命”，而 Jokowi 要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反贪腐和透明、互助、创意、独立、尊重差异等等都是重点。

而两人成为竞选搭档之后，民调支持度持续上升，特别是民主运动人士，学者，音乐家，年轻人，学生，商人，大众阶级等等特别支持。支持者都自动自发参加活动，一些人甚至自掏腰包。而相反地，其对手 Prabowo 和 Hatta 主要是被贪腐的集团，金钱，保守派所支持的。

2014 年 7 月 22 日，选委会最后宣布了 Jokowi-JK 的胜利，获得了 53.1% 的选票。而对手 Prabowo-Hatta 获得 47.8%。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并说 Jokowi 的胜利不是代表政党的胜利。Jokowi 的支持者主要不属于任何政党，无党无派。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投票。

现在，我们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有了新的希望。新的政治文化但生了，这将是印度尼西亚社会转型的重要一步！■

来信寄给 Lucia Kusumadewi <lucia.ratih@ui.ac.id>

> 财团化印度尼西亚的教育

by Kamanto Sunart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C04) and History of Sociology (RC08)



图：Jakarta的学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

在印度尼西亚的改革运动于1998终结了威权军事政府统治之后，新的教育改革方案推出了，但是充满争议。从2003年的宪法法庭成例之后，人民可以挑战违宪的法律。而过去

的十年间，教育者，学生，公民团体已经把目标对准了教育相关法律了。

而1999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可以企业化。而理由是要让教育可以更自

>>

主，提升全国的竞争力，好来响应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浪潮。结果，在 2000 和 2010 年之间，政府私有化了 6 间公立大学和 2 间公共教育机构。

公共大学的私有化引起了很大的反弹，特别是来自家长和学生。过去的学费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公共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张后，政府已经无法负担庞大的开销，所以学费成为了收入的重要来源。学费调涨已经是司空见惯。然而，抗议的人很悲观，因为校方态度很坚决。

而 2003 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法案，要把所有的教育机构企业化，不论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都要。而且，各种教育，高等或是技职教育，政府都要企业化。而这个法律在 2009 年正式颁布。

这两个新的法案会让现有那些私校集团感到威胁，因为他们的权力会大大缩减。2006 年有 16 所私校和非政府组织要求宪法法庭审查的个法案，特别是企业化的部份，可是这项要求被否决了，因为他们说法律还没有生效。

家长，学生，公民团体等也开示要求审查这个法律，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教育公共化，并防止企业化教育的事情发生，避免商业化。他们认为教育是公共财，而教育的整个支出是国家要负责的。他们认为任何法教育开销转嫁

到社会的行为都是违宪的。

2009 年，私校和非政府组织团体联合学生、老师、讲师、家长、学者等，来自各个领域，以起提出了 5 个要求审理 2003 和 2009 年法律的要求。这得到了响应，就是法院重新更改了 2003 年的法律，并且取消了 2009 年的法案。

在许多的案例之中，这些挑战是针对教育改革许多面向而来，并反应了许多抗议者个社会位置。管理教育机构的组织有兴趣的是去维系整个私人教育机构。这些人反对企业化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失去控制该机构的权力。而在要求审理 2003 年和 2009 年的法案之后，他们对于企业化的抗议也随之中止了。

而 2009 年法案之后，政府又在 2012 年发布了一个新的高教法案，让公共教育可以企业化。2013 年的大学法律系学生要求审查 2012 年法律的其中 6 项，不过被拒绝了。

而什么上学生、家长，学者、社会团体成功可以上宪法法庭的呢？虽然 2003 年的法律被修改了，2009 年的取消了。但是免费教育和反对企业化并没有实现，总之，法庭的意思是：

1. 学生必须付学费，并且政府有权控管。
2. 公共高等教育必须

要分配预算的 20% 去奖励表现好的贫穷学生，但是最多就是 20%。

3. 公共教育机构允许不同的学生来源，而宪法把这个决定权看作是 affirmative action，但是学生看到的饰品化。

4. 而合格的公共教育机构一直都没有反对。

学生，家长，公民团体已经用尽所有的方式去争取免费公共高等教育了，但是宪法法庭的节论是不能修改的。这项挫败让整个运动士气大失，目前也没有新的计划去反对高等教育商品化。然而，学生仍然持续反对高学费，并且争取给予贫穷学生的补助，可是现在决定权落在学校身上，而非政府。■

來信寄給 Kamanto Sunarto
<kamantos@yahoo.com>

> 印度尼西亚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

by Hari Nugroh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Labor Movements (RC44) and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s and Social Change (RC48)



图：印度尼西亚的劳工运动，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印度尼西亚的劳工运动在政治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似乎又复苏了。2014年，几位工会领袖被选为地方代议士，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因为在过去50年间从来没有这个例子。随之的辩论，像是工人斗争从工作场域扩张到其他的场域，正在展开之中。而过去也有类似的政治实验。而我们要问的是：工人运动可以转变印度尼西亚的阶级政治吗？

>>

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在威权正体于 1998 年瓦解时开始的，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包括劳动场域的冲突。而国家的控制也被市场所取代，流动的资本在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中成为了新的敌人，也就是对工会发展的冲突。而新工会的基础已经被过度弹性化的劳动市场所侵蚀，即使在 Suharto 政权解体时的新工会成立时也是。

今日的情况让工会聚焦在反弹性化。传统的方案包括了增加工资，集会自由，反对资遣等等，也被纳入新方案。工会也批判国家的自由化劳动政策和企业的危险工作环境 (Juliawan, 2011)。工会因此要争取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系统，使得让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得以改善，也让工人的伤害减轻到最低。而工会运动也在再社会福利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创造了更多的工会人数。

而工会人数的增加也代来的新的挑战，特别是工会为了要去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去面对市场的侵略。虽然许多工会仍然很保守，很多地方工会也和进步的全国工会合作，主要追求两个策略。第一是纳入那些潜在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社群里面，但也和其他的群体见李关系，包括了农夫和小贩。第二个策略逝去影响选举政治。这里的目标是建立地方议会的代表性，开创一条迈向全国议会的路，去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参加选举也是一个扩大工会支持的策略。

而工业冲突的图像和工会主义的转变，这两者在后 Suharto 时代可能激起了更多的工人阶级运动。但是收获还有待确认 (Hadiz, 2001)。例如，两个进步工会的领导人都在 Bekasi 工业地区，靠近 Jakarta，他们都成功的在 2014 年选上国会议员，从这次开始，他们赢得了军队的支持，这也是一个成功实验。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之后，全国工会领袖也采取了更具有争议性的位置，介入 2014 的总统大选，去动员工会成员支持某个候选人，而该候选人是 Suharto 威权时代位居要职的官员，也被伊斯兰群体所背书，在工人阶级中没有什么支持者。这也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工会领袖的阶级政治利益。

同质，许多其他的工会实验在地方选举都失败了，因为没有赢得足够多的选票，连工人也不太投票给他们。许多人赢得选举并不是透过工会的资源，反而是其他的政党给予支持才当选。这些人不搞阶级政治，而对金权政治和其他宗教意识形态竞争比较感兴趣。

一个类似的情境在他们扩大工会成员时也

看得到。虽然一些工会很成功地建立广泛的网络和交换社会政治的支持，然而却很难建立策略性的共同利益。每个群体都要去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而支持都是透过群体尖的交换而来，和工人的利益全然无关。相似地，成功地推动全国社会安全系统也让工人阶级和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连结，但这不能被视为是阶级政治的成功。这反应了跨阶级的联合，而非公人阶级的利益。

虽然有乐观的一面，不过现今印度尼西亚的劳动运动是有所不足的，特别在社会基础上是如此。虽然年轻的一代组成了主要的劳动市场，也是工会的支柱，但是从来没有在威权统治下生活过，反之，他们是历经去政治化的一代 (Caraway et al., 2014)。劳动冲突、社会运动、集体意识等等，这些都不足以可以行程一个巩固的阶级政治基础。此外，跨阶级的利益和吉他认同，例如宗教，也是工人阶级政治的敌手。

来信寄给 Hari Nugroho <hari.nugroho@ui.ac.id>

References

- Caraway, T. L., Ford M., Nugroho H. (2014) "Translating membership into power at the ballot box? Trade union candidates and worker voting patterns in Indonesia's national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http://dx.doi.org/10.1080/13510347.2014.930130>
- Hadiz, V. R. (2001) "New Organising Vehicles in Indonesia: Origins and Prospects," in Jane Hutchison and Andrew Brown (eds.) *Organising Labour in Globalising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uliawan, B. H. (2011) "Street-level Politics: Labour Protest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1(3): 349-370.

> 当宗教成为 合法的认同

by Antonius Cahyadi,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RC22) and ISA Thematic Group on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Justice (TG03)



图：印度尼西亚的身份证上有宗教字段。

在 Suharto 时代的尾声 (199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公共领域充满了宗教情绪和种族排外的氛围。穆斯林、华人等被视为非印度尼西亚人，在那时相当辛苦。这些敏感的议题在 1998 年的暴动之中被突显出来，并启动了“改革”，让 Suharto 的新政划下了句点。

对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种族歧视在 2000 年被印度尼西亚的第四任总统 Abdurrahman Wahid 废止了。这个是在 1967 年 Suharto 上台时的政策。儒教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的传统宗教，并在 2006 年被定为合法宗教。当种族歧视比较退潮的过去十年间，宗教的歧视还是持续着。而这个议题也相当敏感，人们都在公共领域中尽量避免谈论这个话题。政治场域没有任何宗教的讨论。

而综观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宗教一直被政治所用。在 1970 年代，宗教合法认同的官僚化

到达的最高峰。在荷兰殖民时代 (从 19 世纪早期到 1942 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是被认为一种政治威胁的，因为它可能备用做反抗殖民的手段。而殖民政府让“宗教的伊斯兰”继续，可是压制政治上的伊斯兰认同。类似的政策也禁止了原住民的宗教活动。所以宗教被限制在个人的领域。

在日本殖民期间 (1942-1945)，伊斯兰教变成了战争的策略。日本人动员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群体的反荷兰情绪，开启了一个政治部门，专门去掌控和动员伊斯兰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这部门变成了宗教部。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早期 (1945-1959)，部份参与独立运动的伊斯兰团体认为他们功不可没，所以提议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伊斯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另外，世俗的民族主义团体，包括了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则认为印度尼西亚

应该包容各种宗教。

而这两派之间的妥协则在 1945 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 29 条中可以看见。首先，印度尼西亚并不是一个世俗国家，因为它是建立在神的信仰上的，可是，这并没有说是什么宗教的神。此外，印度尼西亚也保障宗教自由。但是妥协还是有，那就是在 1946 年的宗教部的成立，这是为了伊斯兰教而设立的。

在 Sukarno 的“领导民主”（1959-1965）时代，宗教团体和非宗教团体之间越来越分歧。而另外不同宗教（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也越来越紧张。Sukarno 的民族主义团体倾向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比较中立。为了让宗教团体在无神的共产主义攻击中感觉到被保护，以及争取其他的宗教团体支持，Sukarno 于 1965 年引介的反亵渎法。后来这个法案成为了伊斯兰化的基础，因为这特别是用来禁止人们做出反对宗教的举动（特别是伊斯兰教）。

在 Suharto 时代（1966-1998），宗教变成相当官僚。反亵渎法案成为了公共领域中宗教的护身符。有了这个法案，Suharto 政权承认许多宗教，像是伊斯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但是不包括儒教和在地信仰。

从 Suharto 时代，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要公开在身分证上说明自己的宗教。而宗教部也成为了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此外，1974 年颁布的婚姻法律也让宗教权力在政治上扩张了，也就是若要结婚和生小孩，那么一定要先有宗教信仰。同时，1989 的宗教法庭法案也让宗教影响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张，到了法律场域之中。宗教成为了合法认同。而宗教部也让宗教的权力扩张了，赋予力官僚的地位，而且穿透了国家部门，进而区分公民身分。这是 Suharto 如何把宗教收编的故事。

而随着改革（也就是 Suharto 在 1998 的辞职），印度尼西亚的公共领域变成了多团体竞逐的场域（宗教、族群、地分、民族群体等），争取公共的注意和国家的认可。在改革时代也出现了政治化的伊斯兰运动，发生在 1999 年，

在 Moluccas 的一场宗教冲突中他们被驱逐了。这个事件导致了对于其当没有被承认的宗教和其他的伊斯兰群体（Ahmadiyya, Shia, Sunni）认同可以在公共场合中公开。2006 年后，儒教和其他地方信仰后来的承认也让其他没有被承认信仰的人可以结婚。现在的人可以让身份证上的宗教字段空白了。

可是，宗教在政治上还是很有影响力，这说明了宗教还是比其他的社会文化力量还要有影响力。宗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公共领域也是复杂的。可是，很显然，当宗教成为了合法的认同，就会变成国家的工具，被统治者所用。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说宗教可被国家所收编，用来掌控人民日常生活。如此一来，宗教成为了政治，不再具有神圣性。

来信寄给 Antonius Cahyadi <antonius.cahyadi@ui.ac.id>

> 在印度尼西亚 向上流动

by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C04)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C28)



图：Jakarta的社会阶层化

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起来了，从中收入国家变成了G20的成员。此外，印度尼西亚也达到了政治、金融和经济的稳定阶段，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World Bank, 2014a) 尽管这个令人称羨了成长，不平等也恶化了。看看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就知道，从1999年的0.33到2011年的0.41。这个各

>>

化趋势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贫穷的持续，缓慢的经济成长，以及频繁的社会冲突和紧张。此外，不平等也反应了不公民的公共社会服务的取得。一个在底层的小孩有43%的机会会有成长缓慢的问题，而上层的小孩只有14%的机率。同样的，辍学的机率也相差甚远：71%的底层学童很早就辍学，而只有26%的上层阶级小孩有这个现象。(World Bank, 2014b)

很多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不平等已经是个显著的现象了，特别是在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上。而什么样的人再这个流动中是最成功的，又受到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呢？我的研究检视两个省的都市不平等，企图回答这些问题。两个省是东爪哇和西爪哇。数据源是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IFLS)1993-2007年的贯时性资料。这个样本包括了1177位男性和女性。年龄层从20-64岁。

而印度尼西亚都市的社会流动对于上层阶级来说是比较大的。(Pattinasarany, 2012)数据显示了有27%的下层阶级流动到中间阶级，而45%从中接阶级到上层阶级。事实上，对于下层人民来说，流动机会是很渺茫的。就像阶级的僵固性，职业的僵固性也是很显著，多数人继承了父母亲的职业。

关于性别呢，在控制了职业之后，男性更有可能向上流动，对于下层阶级来说，这个性别因素更加显著。这个结果显示了社会要求女性去扮演女性的角色，在家中或是职场上都是如此，让她们忙不过来，更不可能向上流动。此外，教育也是显著的变项之一。高教育的人有多的机会向上流动。而父母的阶级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比教育还大。

而我在爪哇乡下的质化分析中发现的结果和我的量化分析结果是吻合的，下层阶级很难往上流动。可是，有趣的是，我看到了例外。有三个例子：

- 许多人选择到国外工作，当移工，特别是家务劳动(女性)和工厂或建筑工人(女性)。而选择当移工的决定主要是受到工作机会缺乏的影响，这对于低教育的印度尼西亚人特别是如此。此外，移工做同样的工作来说，可能比在印度尼西亚还赚更多的钱，而他们甚至有能力强汇款回到家乡。这些汇款可以帮助移工家庭

向上流动。

- 另外一条路径是透过代间的特殊技能的传承。在西爪哇的Garut社群中，理发师是最有名的。几十年来，这个技能被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许多都市成功的理发店都是从这边而来。特过这些特殊的技能，家庭是有较多的机会向上流动。

- 第三个路径是创业。在许多村庄，有许多创业者一开始是自雇业者，但是后来成为了小有规模的店，然后甚至扩张到了邻近的村子里面。这通常都是小本生意，像是餐厅或是零售商。而根据地区的不同，许多的创业者可能跟银行借贷或是从政府那边取得资金，跟社会企业合作。成功的创业是会造向上流动的。

进一步的研究是要去解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僵化，以及为什么停滞的社会流动会持续。这些研究希望可以带来进一步的政策讨论，进而改变社会流动停滞的现状。■

来信寄给Indera R. I. Pattinasarany <indera.pattinasarany@ui.ac.id>

References

Pattinasarany, I. R. I. (2012) Intergenerational Vertical Social Mobility: Studies on Urban Society in the Province of West Java and East Jav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Graduate Program,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World Bank (2014a) "Indonesia: Avoiding Trap."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4. Jakarta: The World Bank Office.

World Bank. (2014b) "Understanding Inequality." Booklet from Big Ideas Conference. Jakarta: World Bank Group, September 23, 2014.